

朝鲜半岛儒释道三教和合

张立文

(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, 北京 100872)

[摘要] 儒教、佛教、道教在不同时期传入朝鲜半岛, 其显著的特点和性质为“三教和合”。三教和合贯穿朝鲜半岛每个时期、每个王朝。花郎道、《十训要》、性理学、朝鲜李朝的李退溪和李栗谷、《东经大全》是体现朝鲜半岛三教和合文化的文化形态、代表性人物和文本。朝鲜半岛的学者和思想家们不断吸纳和融合三教的精华, 形成了具有朝鲜半岛特色的文化体系。

[关键词] 三教和合; 花郎道; 《十训要》; 退溪; 性理学

DOI: 10. 3969/j. issn. 1002 - 1698. 2025. 02. 003

儒释道三教在朝鲜半岛的融合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, 其过程充满了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火花。从早期的传入到后来的深度融合, 三教在朝鲜半岛上形成了独特的和合文化。这种和合不仅体现在思想层面的交融, 更在社会实践、艺术创作以及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。儒家的伦理道德、佛教的生死观与修行方法、道家的自然哲学与养生之道, 在朝鲜半岛上相互渗透、相互影响, 共同塑造了半岛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, 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。

一、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何时传入

儒释道三教和合是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朝鲜、越南历史哲学文化的传统, 并成为其传统的核心内容。韩国与朝鲜古代未分, 与中国相邻, 儒教何时传入朝鲜, 通常有以下五种说法: 殷太师箕子避周以来, “以洪范九畴之道教化东方”^[1]说; 秦汉之际流入说; 汉设立四郡之后说; 三国时代起源说; 以高句丽太学设立为起点说。基于这五种说法, 金忠烈教授认为儒教入朝鲜半岛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 4 世纪左右, 儒学的受容则在汉四郡时代。^[2]柳承国教授认为: “儒教思想的传入, 则远从卫满朝鲜、汉四郡时代以来, 汉朝的文物制度与学术思想已被全盘的移植、输入。当时有乐浪人王景, 于汉明帝时因治水有功, 被封为庐江太守, 其人不仅能通《周易》……可见早在乐浪时代, 能通中国古典的人已不少。”“在卫满朝鲜时代……从当时汉字的传来, 可推测汉字中所包含的儒教思想亦已被传入, 习得。”^[3]

尽管儒教究竟什么时候传入朝鲜的说法不一, 但可确定在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(327)时建立太学

作者简介: 张立文,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荣誉一级教授。

教育子弟之前已传入,并受容,开始与朝鲜传统思想习俗相融合。在《三国史记》中崔致远讲朝鲜半岛人的生活准绳与思维形式为“国有玄妙之道,曰‘风流’。设教之源,备详《仙史》。实乃包含三教,接化群生”。三教即指儒、佛、道三教。风流道与花郎道有密切关系。花郎道从本质上说,亦为儒、释、道三教的和合。

佛教传入朝鲜半岛三国(高句丽、百济、新罗),首先是高句丽。小兽林王二年《三国史记》记载:“秦王苻坚,遣使及浮屠顺道,送佛像经文,王遣使回谢。”后传入百济、新罗。儒教和佛教在高句丽的小兽林王二年同时在国家公认下接受下来,又共同相辅相成。第二年有僧人阿道前往,由此高句丽建肖门寺和伊弗兰寺,并由顺道和阿道二僧为住持,开始传播佛经。除二僧外,还有东晋关中僧人昙始于公元396年进入高句丽传教,并带入经律数十部。于是他们三人皆为高句丽著名的传教僧。《海东高僧传》记载:昙始所带佛教经律“乘机宣化,显扬三乘”。“三乘”是指小乘教的声闻教和缘觉乘,大乘教的菩萨乘。皈依是三皈依:皈依佛、法、僧三宝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的五戒。

佛教传入百济,后于高句丽。百济第十五代枕流王元年(384)百济使臣从东晋返回时印度僧摩罗陀跟着进入百济,枕流王奉赞佛教,并在民间传播开来,到第二十五代圣王时(523—554)佛教作为国教发展兴盛。

佛教传入新罗约在五世纪初訥祇王(417—458)时,直到法兴王十四年(527),时新罗以民族神为唯一最高神,但佛教逐渐在民间传播开来,法兴王欲提倡佛教,受朝臣的反对,近臣异次顿坚决支持弘扬佛教,奏说:“斩小臣的头,以压公议。”国王拒绝。异次顿说:为佛教兴隆而牺牲生命并不遗憾。临死前说:“我为佛法受刑,佛必有灵应。”如出现大地震现象,于是新罗便兴起佛教。

中国的道家和道教在三国时期已传入朝鲜半岛。《三国遗事·宝藏奉卷》记载:“丽季、武德、贞观间,国人争奉五斗米教,唐高祖闻之,遣道士,送天尊像,来讲《道德经》,王与国人听之。即第二十七代荣留王即位七年,武德七年甲申也,明年遣使往唐,求学佛老,唐帝(高祖)许之。”在高句丽末期,唐武德、贞观年间(618—649)中国的五斗米教和《道德经》已在高句丽传播。道教的神仙说教与高句丽传统神仙信仰有着密切联系,这是高句丽人争信五斗米教的重要原因。

道教传入百济是较暧昧的。咒术的道教不像高句丽五斗米教盛行。在近肖古王时,莫古解的谏言中说:“尝闻道家之言,‘知足不辱,知止不殆’,今所得多矣,何必求多。”在《三国史记·百济本纪》中记载:百济武王三十五年(634),“春二月,王兴寺成。……四岸植以杨柳,水中筑岛码,拟方丈仙山。”“方丈仙山”是晋王嘉所著《拾遗记》中的海上三仙山之一。道教神仙思想在百济得到流传。

新罗到七世纪时,老子庄子思想已得到传播,并已把《老子》《庄子》列为教育贵族子弟的教材。在新罗圣德王去世时,唐太宗遣左赞善大夫邢璣以鸿胪少卿前去吊祭,他到新罗以老子《道德经》等献给新罗王。圣德王十八年(719),金志诚在庆州造甘山寺,他在《庆州甘山寺弥勒菩萨造像记》中自述,“性谐山水,慕老庄之逍遥,志重真宗,希无著之玄寂,……披阅五千言之《道德》,弃名位而入玄;穷研十七地之法门,坏色空而俱灭。”老庄之学与佛教并行不悖。《东国通鉴》记载:“惠恭王(765—780)……好佩锦囊与道流为谑。”已见有道士活动。新罗有个人修炼成仙的传记。

儒教、佛教、道教在中国并不能非此即彼,而是和合共生,在传入朝鲜半岛后高句丽、百济、新罗虽时间、地位、价值、传播、受容的情况有异,但在整体上道并行而不相悖,三教与当地的传统文化、习俗、信仰相互融突,而成为朝鲜半岛的儒教、佛教、道教,其显著的特点和性质为“三教和合”。“三教和合”成为其核心内涵和主导思想哲学形态。

二、花郎道人物三教和合

“三教和合”与新罗的风流道相融合,而具有传统思想的根源性,体现为花郎道。新罗真兴王时创设花郎道,它具有政治、宗教、道德的性质,新罗著名学者崔致远(857—?)在其《鸾郎碑序》中说:“国有玄妙之道,曰‘风流’。该教之源,备详《仙史》。实乃包含三教,接化群生。且如入则孝于家,出则忠于国,鲁司寇之旨也。处无为之事,行不言之教,周柱史之宗也。请恶莫作,诸善奉行,竺乾太子之化也。”新罗的花郎道,又称风流、风流道(风月道),如果说风流道是要人间依凭天地自然来体验生命根源,那么花郎道是从自然中获得风流性,体验生命的群体性。

花郎道是在真兴王三十七年(576)正式形成,其始于男女怀情的浪漫风俗。^[4]由风流道演变而来的花郎道,成为国家活动的主体。原来新罗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的和合体。《三国遗事》中载有“万波息笛”的神话传说,反映了其国人的思维模式趋向于合,认为“和合”才有力量,并带来利和善,这就成为新罗人的思维原型,脱胎于“和合”文化思维的花郎道,乃实为三教和合的产物,当花郎是左右国家兴亡,寄托未来的众所希望的对象时,便出现花郎五戒。在《海东高僧传》圆光条中记载,五戒内容:“事君以忠[忠],事亲以孝[孝],文友以信[信],临战不退[勇],杀生有择[仁]。”^[5]所谓“杀生有择”,是指春夏月不杀,是择时;不杀使畜,谓马牛鸡犬。不杀细物,是择物;如此唯其所用,不求多杀。即分别择时、择物、择量。“临战不退”,在当时三国频繁交战的情况下,是新罗在战争中战无不胜的原因。

花郎道具有“三教和合”的性质,“新罗吸收的中国儒教是先秦时代重视实践道义的原始儒家思想。而道教也非宗教的,是结合自然主义的老子和智慧主义的庄子的精神自由之道家思想。再者,佛教也正是中国化的天台、华严与纯粹宗教性的涅槃、净土、弥勒思想盛兴的时候……儒教的道义规范是人自觉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在。道教的精神自由扩大了生活的浪漫和智慧,佛教的佛国净土则予以实现并具体化。”^[6]三教互补互济,协调和合,体现了新罗时代的时代精神,即以和合为主体精神,并成为其民族精神核心内涵,具有民族性的价值和意义。

三、《十训要》的三教和合

新罗末期,王室内部自我分裂,政治腐败,社会混乱,田制亦乱,人民穷困。地方土豪各自发展自己势力,相互冲突。北方的弓裔自称后高句丽,南方的甄萱自命后百济,形成后三国分裂局势。在其相互动乱冲突中,胸怀睿智、度量包容、信仰佛教的王建(897—943)辅佐弓裔,稳定政局,但弓裔迷惑于新罗末以来弥勒信仰,自称弥勒转世,惑世诬民,骄奢淫逸,大建宫殿,劳民伤财,且杀戮百姓,虐待妇孺,民怨沸腾。^[7]鉴于这种情况,弓裔手下的儒家大臣一致拥护文武双全的王建为高丽太祖,王建于新罗明王二年(918)登上王位。结束了混乱的三国,说明他之所以喜好佛是为了安抚建国前后不安定的民心,他坚信治国之本是通过儒教移风易俗,教化民众。王建开放包容佛、道、儒三教融突和合,为其思想特征,体现了时代精神。

作为高丽太祖的王建,为了使其后代君王避免于情欲,严守纲纪,规定早晚必须诵念十条训戒。太祖二十六年(943)四月(在其死前一个月),将朴述希(?—945)请到内殿,以遗言的口气讲了有关国体,国是大经、大法等十项,并令后代君王遵行。《十训要》:

(一)我国家大业,必资诸佛护卫之力。故创禅教寺院,差遣住持梵修,使各治其业。后世奸臣执政,徇僧请谒,各业寺社争相换夺,切宜禁之。

(二)诸寺院皆道洗,推占山水顺逆,而开创道洗云:吾所占定外,妄加创造,则损薄地德,祚业不永。朕念后世国王公侯后妃朝臣,名称愿堂,或增创造,则大可忧也。新罗之末,竞造浮屠,衰损地德以底于己,可不戒哉?

(三)传国之嫡,虽曰常礼,然丹朱不肖,尧禅于舜实为公心,若元子不肖,与其次子又不肖,与其兄弟之众所推戴者,俾承大统。

(四)惟我东方,旧慕唐风。文物礼乐,悉尊其制。殊方异土,人性各异,不必苟同。契丹是禽兽之国,风俗不同,言语亦异,衣冠制度,慎勿效焉。

(五)朕赖三韩山川阴佑,以成大业。西京水德调顺,我国地脉之根本、大业万代之地。宜当四仲巡驻,留过百日,以致安宁。

(六)朕所至愿,在于燃灯、八关。燃灯所以事佛,八关所以事天灵及五岳名山、大川龙神也。后世奸臣建白加减者,切宜禁止。吾亦当初誓心会日不犯国忌,君臣同乐,宜当敬依行之。

(七)人君得臣民之心为甚难,欲得其心,要在从谏远谗而已。从谏则圣。谗言如蜜,不信则谗自止。又使民以时,轻徭薄赋,知稼穡之艰难,则自得民心,国富民安。古人云:“芳饵之下必有悬鱼,重赏之下必有良将,张弓之处必有避鸟,垂仁之下必有良民。”赏罚中则阴阳顺矣。

(八)车岬以南,公州江外,山形地势,并趋背逆,人心亦然。彼下州郡人,参与朝廷,与王侯国戚婚姻,得秉国政,则或变乱国家,或卸统合之怨,犯蹠生乱。且其会属官寺奴婢驿杂人,或投势移免,或附王侯官院,奸巧言语,弄权乱政,以致灾变者必有之矣。虽其良民,不宜使在位用事。

(九)百辟群僚之禄,视国大小以为制,不可增减。且古典云:“以庸制禄官,不以私。若以无功人及亲戚私昵虚受天下禄,则不止下民怨谤,其人亦不得长享福禄,切宜戒之。又以强恶之国为邻,安不可忘危,兵卒宜加护恤,量除徭役。每年秋阅,勇锐出众者,随宣加授。”

(十)有国有家,傲戒无虞。博观经史,鉴古戒今,周公大圣《无逸》一篇,进戒成王,宜当图揭,出入观省。^[8]

《十训要》的宗旨是儒、佛、道三教的和合。其中(一)(二)(五)(六)(八)是关于阴阳浮屠,即佛教和道教思想内容。第一条高丽国家大业的创建,不仅依靠诸佛护术之力,还靠山川的阴佑,山川风水地理之力,如五岳、名山、大川、龙神、天神等。第二条认为新罗末期,争相营造寺院,损害了地德,而导致国家灭亡,建造寺院要符合山水顺逆。以山环水绕为顺,反之为逆。第五条按照三韩山川的阴佑(地气),才完成统一大业,西京(平壤)因水德调顺,是半岛地脉的根本。第六条所谓燃灯是指事佛,八关是指敬天灵、五岳、名山、大川的龙神,是道教的自然信仰。第八条车岬(车岭山脉)以南、公州江(锦江)以外,山形和地势互成背逆而不同,人心亦一样。下面州郡的人,若参与国家政治或通过与王亲国戚通婚,得以秉持管理国政的话,会致使国家动乱。^[9]这种以山水背逆决定人心背逆论,是一种风水决定论,但古人却相信风水,这是时代的局限。

《十训要》的(三)(四)(七)(九)(十)五条与儒教有关。第三条昭示王位继承的次序和原则,即以嫡长子继承大统为原则,长子不肖,推戴次子或兄弟中贤能的人。长子继承法是中国周代以来的儒家传统宗法。太祖特举尧因其子丹朱不肖而将王位禅让给舜,并称赞尧公正无私的精神。太祖王建以尧为楷模。正如高丽王朝的崔承老(927—989)所说,这是与儒家天命相符合的,也就是说王建创建高丽王朝是天命。第四条,我东方自古以来仿效了唐的风俗。文物、礼乐都遵守其制度,但因与唐为殊方异土,所以不必完全一样,强调其特殊性、自主性和自主性。但唐代总体上是儒、释、道三教兼容并蓄,协调和合。第七条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,依照民心,顺从谏言而远谗言,使民以时,轻徭薄

赋,才能使国富民安,体现了太祖治国理政的原则是根据儒家民为邦本的爱民思想。第九条人君要体恤大小官吏和全体将士,并须加强当官纪律,不能有私,若私自对没有功劳的亲戚授予俸禄,造成上下的谤议和民怨,这样的官员不能长久享受俸禄。对于与强恶的国家为邻,绝不可安而忘危;对于兵卒要加以保卫和抚恤,适量除掉徭役,对于奋勇出众的,应加以奖励。太祖王建在统一三国后,礼贤下士,勤于治国理政,崇尚节俭,宫室简陋,衣着朴素,发扬社会正气。崔承老认为太祖“知人善任,惩恶不殆,尊信佛教,崇尚儒术,具备君王一切之德,且胸怀保国之策”。体现了儒家王者风范,继承了儒教“王道”精神。第十条有国有家,家国同构。要博学经典和历史,借古圣贤以鉴今,以周公成王的书画成图,挂于墙上,出入必省视,以示不忘。要修身文德,以巩固国家的基业,告诫后世君王要统率百官及子弟学习儒教的书籍和实行儒教礼仪。新罗时已有“大学”。太祖亲到西京(今平壤)创办学校,集合六部生徒,立廷鹵为书学博士,大学教学内容以儒教经典为本科,法学、医学、算学为别科。对教育有成就的人,太祖赐以布匹,谷食奖励。为使臣民明事奉人君及父母礼节,倡导儒教忠孝思想。太祖著《政戒》一卷和《戒百寮书》八篇颁布全国。《高丽史·李齐贤传》记载:“光庙之后,益修文教,内崇国学,外列乡校,里庠党序,弦诵相闻,所谓文物侔于中华,非过论也。”由于以儒教思想培养国家人才,致使“高丽朝五百年之根基乃于此而立”。^[10]

太祖王建《十训要》为儒、释、道三教和合,成为高丽时文化思想根本国策和意识形态指导方针。因而儒者士大夫信佛教,僧侣兼通儒学经典、诗文,无论在显宗、睿宗,或是在仁宗、毅宗时,都有士大夫信佛,如崔沆舍身为寺,李资玄弃官入清平山文殊院,崔惟清酷好佛日诵佛经等。高僧大德兼通儒家经史、诗篇,或关心国家大事,如文宗时慧德王师韶显于传法之外,喜好儒术,博览经史、诗篇,大觉国师义天博览强记,大小乘经,律论章疏无不探究,对儒老的书,子史实录百家之说都以探究,认为言乎大乘与周孔之道同归,言乎天乘与老庄之学一致。^[11]由此可见,高丽朝儒、释、道三教可谓里表和合,内外和合。

四、性理学的体用三教和合

高丽末期,内忧外患加剧。《高丽史·李齐贤传》记载:“毅王季年,武人变起,玉石俱焚,其脱身虎口者,逃匿穷山,脱冠带而蒙伽梨,以终余年。”仁宗时代的权臣李资谦、妙清之乱;毅宗时的武臣郑仲夫之乱;明宗时的亡伊、金沙弥之乱;高宗时契丹、倭寇入侵;元宗时的三别抄之乱。在此恶性循环中,社会动乱不安,佛教随时代的变迁,亦呈现腐败的一面,与权利层勾结,行为不当;儒学衰退。^[12]《高丽史·忠烈王世家》记载:“今日之儒者唯学科举之文章,而无博通经史者,使能通一经一史以上者,教国子生。”他们唯有通过科举,以谋取功名利禄。

尽管随时代的发展变迁,高丽末期出现各方面衰落现象,但与中国关系和谐,学校交流频繁,派往中国的留学生不断增长。高丽睿宗十年(1115)派金端等五名进士到宋并进入大学。宋朝向高丽开放科举(贡科)的门户,于肃宗四年(1099)派遣学习生比睿宗十年早很多,其数量也相当多。这种学术交流,既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传播,也推动了学术思想互学互鉴。

高丽末期的“性理学”,不限于朱子学,包括唐末明初各派思想,而朱子集理体学之大成,王守仁集心体学之大成。高丽社会中最早理解传入朱子学的是安珣,他于忠烈王十五年(1289)入元朝,抄录《朱子全书》,绘孔子、朱子像带回高丽,并刷新了当时的教育思想、教育制度,阐明教育的使命、大学的宗旨,他不满足于儒教的不振,他在诗中说:“香灯处处皆祈佛,萧鼓家家亦赛神。惟有数间夫子庙,满庭秋草寂无人。”^[13]佛老(道)旺盛,而儒教、国学衰微,他倡导儒教教育士子。他对国学中的学生说:“老

佛尚空寂,然须返健全之日常生活之近处求真理。”并在《喻国子诸生文》中说:“圣人之道不过在日常论理,为人子当孝,为人臣当忠,以礼治家,以信义交友,以敬修身,以诚处事,彼佛教弃亲人离家庭,蔑视人伦,逆道义,乃夷狄之徒。”^[14]

朱子学传入后,随着在当时大学成均馆开始讲授,而后朱子学由白颐正、权溥、李穡、郑梦周、吉再等继承发展,郑梦周在成均馆讲朱子《四书集注》,并通程颐的《易传》。重视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真理,佛教在现实层面有所勿视。郑道传从性理学的主场,著《佛氏杂辨》《心气理篇》批评佛教,从而使性理朱子学得到推崇。

高丽末期盛行求福的佛事与田畝、财物的贡纳,造成寺院财力过度膨胀肥大,而使国家财政穷困、贫乏,田制紊乱,社会内部开始有了改革的要求,无论是李穡、郑梦周,抑或郑道传、权近,都从朱子学主场出发,指出佛教的流弊。

随高丽朝灭亡,朝鲜朝成立,学术思想亦发生变化,兴起“亲明政策”及专制改革的要求,接受儒教为主导意识形态。此时儒学者分成两派,以郑梦周、吉再等守节义,而不与新王朝合作;以郑道传、权近等为中心,则襄助李成桂(1335—1408)于公元1392年建立朝鲜王朝(1392—1916)。在朝鲜519年间,性理学是其国学,亦是其政治、学术、文化思想的核心理念,公私学校教育的内容,朝鲜时代的性理学犹如中国的理学,理学的本质是以儒学为体、佛道为用的儒释道三教和合。

性理学者以儒学为体、佛道为用的三教体用和合,体现为郑道传的三教和合观。郑道传是高丽末朝鲜初的儒者,他不顾自己的安危,与握有军权的李成桂一派密切配合,朝鲜朝建立后,作为开国功臣担任国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教育各方面的要职,为朝鲜朝建国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李成桂建国后,即遣中枢院事赵琳使明朝京城,告以新政权的建立,明太祖朱元璋即认可并要其速改国号,于是复遣密直司事韩尚质赴明京,以箕子旧号朝鲜及李成桂出生地“和宁”二名,请明太祖定夺。明太祖以朝鲜之名甚美且自古有之,命以国号朝鲜为宜,李成桂乃于即位第二年(1393)二月十五日改国号为朝鲜,下教境内,并将高丽国都由开城迁都南京汉阳,后改汉阳为汉城府,并成为其政治、文化中心。

儒释道三教体用和合,体现于郑道传的思想著作中,他于公元1394年撰《心气理》,又于1398年著《佛氏杂辨》三篇,将儒释道阐释为理、心、气,但他并没有以佛道二教为异端,主张认识心的佛教和气的道教必依理的儒教。

郑道传《心难气》篇认为佛教的修心法比道教养生法优越,因为心的独立自存和随缘不变。在所有相中,唯心最灵,心体寂然,犹如空虚的明镜,随外缘而不变,应变化而无穷。道教的气犹如四大(地、水、火、风)假合成形,眼耳所追求的声色的欲望及其欲望所造成的善恶,是心的贼,是害心、扰心的东西,修心之前的妄心处于气的支配,修心之后的成无念妄情的绝相离体,气便不能动心和遮蔽心。这是以佛教批评道教。

《气难心》,则是以道教批评佛教。认为万物的资始资生,乃是气的凝聚,若不依于气,若无气,心如何独自灵明。认为心不能独立自存,心的灵明、灵觉是气的一种现象,所有祸根在于心的思虑、计较。“计利较害,忧辱慕荣”,气不得宁日,道教的不妄动,内斯静专,才是使心进入寂照默性的根本,心的知感,岂能祸害气体。

《理谕心气》篇认为在前两篇中,都以心、气为独立存在,而不包容、融合对方。理在天地之先,气由理生,心亦禀生,有心无理,而趋于利害;有气无理,仅是血肉的躯体,与禽兽同归,理在心(佛教)气(道教)之上,统摄心、气。心、气只有在理(儒教)为体的前提下,才能发挥其效用价值。“我存尔心,

莹彻虚明,我养尔气,浩然而生。”这就是说,当心以理为体时,佛教的效能才会体现出来,同样,气才会体现出勃勃生机。郑道传以理(儒教)为体,统摄、协调、和合佛教(心)道教(气),这便是以儒教(理)为体,佛(心)道(气)为用的佛释道三教和合。^[15]

五、李退溪、李栗谷对三教的吸纳

儒释道三教和合是朝鲜朝的学术思想特色,亦是其理论思维的核心。儒体佛道为用的体用和合,主要代表人物有朝鲜李朝朱子学的双璧李退溪(1501—1570)、李栗谷(1536—1584)和花潭徐敬德(1489—1546)、高峰奇大升(1527—1572)。畿湖人称李珥(号栗谷)为“东方的圣人”,尊奉新儒学的朱子学。他与当时人视佛老为异端有异,并深研佛老之学和阳明学。栗谷出身于名门,他的人生目标是成为圣贤。16岁教他写字、读书、诗文的母亲申师任堂逝世,他守丧三年,有感于人生生死问题,19岁进入金刚山,在摩诃衍道场熟习佛道。20岁到江陵,作《自警》11条,第1条曰:“先须大其志,以圣人为准则,一毫不及圣人,吾事未了。”他试图和合佛道。《栗谷全书·年谱》记载:“先生自少为学,专用心于内,以收心养性为本。其在内艰,孝思罔极,不能自制,殆至毁性。偶着释氏书,遂有以妄塞悲之意。因染禅学,欲谢人事而一试之,至是遂作金刚之游,以书留别诸友。”^[16]其研读佛书,是以收心养性为本。收心养性要诚。“诚者,天之实理,心之本体。”^[17]“故诚实为躬行之本。”^[18]栗谷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与诚相联通。

栗谷与道教思想受容、和合,体现在其研究老子《道德经》的著作《醇言》^[19]中,《醇言》是栗谷从老子《道德经》八十一章中选出2098句话集中起来,加以儒释道的诠释。《醇言》第一章: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。”录朱熹的注释,“朱子曰:‘道即《易》之太极,一乃阳之奇,二乃阴之耦,三乃奇耦之积,其曰二生三,犹所谓二与一为三也。其曰:三生万物,即奇耦合而万物生也’”。^[20]以阴阳奇耦的和合而生万物,犹“和实生物”。

《道德经》曰:“万物负阴而抱阳,冲气以为和。”引宋代道士董思靖注解,“董氏曰:凡动物之类,则背止于后,阴静之属也。口鼻耳目居前,阳动之属也。植物则背寒向暖,故曰负阴而抱阳,而冲气则运乎其间也。温公(司马光)曰:‘万物莫不以阴阳为体,以冲和为用’”。^[21]董氏在其注释引用儒家司马光的解释,意蕴儒道和合。通书的注解都体现儒家思想家、哲学家和道家、道教对老子思想的理解和注释。

作为“东方百世之师”的李滉(号退溪),绍承朱熹理体学,并与朝鲜实践相结合发展,创造为朝鲜朱子学。李滉“集大成于群儒,上以继绝绪,下以开朱学,使孔孟之道焕然复明于世”,^[22]称誉海内外学林,乃成“朝鲜之朱子”,他对道教的养生学发生兴趣。韩国退溪学研究院影印并公刊《活人心方·退溪先生遗墨》。《活人心方》是玄洲道人涵虚子关于道教养生的著作。退溪手抄并图画,可见其对道教养生的重视,这是与身体健康既能使精气神充沛,又能更好创造性转化朱子学和创新性发展韩国朱子学有关。该书的书尾有退溪第十世孙志淳公的小跋:“先祖遗墨甚多,而若画本,则绝无,惟此卷人物图在焉。非凡手倩写,子孙当知此宝守。志淳谨书。”退溪对道教养生思想予以身体力行,以求强心健体,以利于实践其朝鲜朱子学。就其理论思维而言,乃是以儒为体、以道为用的体用和合。

六、《东经大全》的天人之道三教和合

公元1800年始,韩国进入近代时期,丁若镛和金正喜的理论思维具有近代哲学的因素,但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性理学。东学的诞生,标志着韩国理论思维的近代意义。丁若镛以韩文著述《主教要

旨》，传播天主教教理，翻译《天主实义》，并向大众传播天主教。

东学产生于1860年，其所以称东学，出于反对西学（天主教）故名。其理论思维非儒非佛非道，又似儒似佛似道，为阴阳三教的和合，为朝鲜末期新兴的宗教。创教人为崔济愚（1824—1864），字性默，号水云，为崔致远28代孙。他和合儒、佛、仙道的精神，提倡“人乃天”“天心即人心”的思想，创立东学，并开始传教。著《东经大全》《龙潭遗词》为经典。教徒称崔济愚为“大神师”。1863年11月朝廷称其为邪说诬民，视为邪教，派宣传官郑龟龙抵庆州，逮捕崔济愚，1864年3月被杀害。其弟子崔时亨（1827—1898）等继续传教。

1893年东学教徒推举朴光浩、孙秉熙等40人为代表。3月10日伏跪于京城光化门前上疏，为第一代教祖伸冤。疏文曰：“先师崔济愚之言曰：‘仁义礼智，先圣之所教。守心定气，唯我之更定。’”又曰：“觉来天人之道，则一理之所定也。论其唯我之道，则大同小异也。小异之者，亦非异常别件事也，以诚敬信三端，敬奉天地，事事必告，如事父母，此一段道理，实系先圣未发之事，臣先师始创之宗旨也。”^[23]意蕴东学的宗旨与儒教孔子思想相同，其所谓小异，亦与儒家伦理道德相同。以后李敦化把东学进行创造性的发展。^[24]在韩国近代史上，东学成为甲辰（1904）革新运动的先导，1904年8月30日，东教徒组织进步会，发动20万群众举行示威，要求政府实施改革。又己未（1919）发起“三一”运动，1919年3月1日，东学第三代教祖孙秉熙等33位民族代表在汉城发表《独立宣言书》，高呼独立万岁，并举行游行示威。这一独立运动迅速得到群众支持，全国六百多个团体、200万群众参加反日运动，这是一次抗日独立的国权恢复运动，是民族国家的觉醒。因此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镇压，死亡7500余人，伤16000余人，46000余人被捕。为纪念这一抗日独立运动，3月1日这一天被韩国定为国庆日。东学思想的领导者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，倡导民族独立，成为民族独立精神的支柱和灵魂。

东学的经典是《东经大全》，是崔济愚在1860—1863年为阐明东学教义而撰写的汉文经典。它由《布德文》《论学文》《修德文》《不然其然》《叹道儒心急》《八节》《座箴》《笔法》八章构成。《布德文》是《东经大全》的序论，也是其宣言书，并向世人宣布天主的恩德。《八节》是指明、德、命、道、诚、敬、畏、心修行的八项德目。《座箴》是诚修行要领。《东经大全》阐述东学的宇宙观、人生观、社会观、幸福观、价值观等基本观点，以及“侍天主”“无极大道”“一体同归”的宗教观。它是为建立韩民族的民族信仰，也是一部儒释道三教和合的著作。

《东经大全》体现对儒教的传承，如《论学文》中说：“‘同道言之则名其为西学也？’曰：‘不然。吾亦生于东，受于东道，虽天道，学则东学。况地分东西，西何谓东，东何谓西？孔子生于鲁，风于邹，邹鲁之风，传遗于斯世，吾道受于斯，布于斯。岂可谓以西名之者乎’。”这是对孔孟儒教思想的理解，而与韩国实际相结合，并对儒学天人合一思想加以吸收。《东学精义》曰：“‘故明明其德，念念不忘，则至化至气，至于至圣。’曰：‘天心即人心，则何有善恶也？’曰：‘命其人贵贱之殊，定其人苦乐之理，然而君子之德，气有正而心有定，故与天地合其德，小人之德，气不正心有移，故与天地违其命，此非盛衰之理耶？’”。把《大学》和《周易·乾卦·文言传》的思想与东学思想相和合，以达天心与人心的和合而不相违。

东学对道教思想的摄取，《布德文》讲：“吾有灵符，其名仙药、其形太极，兄形弓弓。受我比符，济人疾病；受我咒文，教人为我，则汝亦长生，布德天下矣。”灵符、仙药，是道教济人疾病的方式和工具，《道德经》宣扬“长生久视”之道。《论学文》曰：“吾道无为而化矣。守其心，正其气，率其性，受其教，化出于自然之中。”《道德经》讲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”“道法自然”“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”。自然无

为是道教的核心内涵,而为崔济愚的韩国思想相融合、汇通。

《东经大全》三教和合,李敦化在《天道教创建史》中说:“1863年10月28日崔济愚的生日,各地门徒前来庆祝。崔济愚环顾左右,向崔时亨说:‘吾道,元非儒、非佛、亦非仙。吾道乃儒、佛、仙合一。即天道不即是儒佛仙之道,而儒佛仙乃天道之部分。儒之伦理,佛之觉性,仙之养气,乃人性自然之禀赋,天道固有之部分。吾道乃取其无极大源者,后之用道者,勿令误解,善以指导之。’”明确东学核心理论思维是儒佛仙三教和合。天道教作为韩民族宗教,体现了韩民族的民族性的觉醒,是民族独立自主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有力武器,以宗教的形式,易为大众接受的方法,动员大众民族自觉、自信、自尊,构建自己民族主体思想、主体宗教,以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殖民思想文化和宗教,是韩国民族独立的先导,为1945年的光复胜利打下思想基础。

朝鲜半岛儒释道三教和合贯穿每个时期、每个王朝。而三教“和而不同”的相处各个时期,都能做到“以他平他谓之和”,没有发生严酷战争,而是和生、和处、和立,这是三教的基本特征。相互平等,相互尊重,和平共处,共立,共达。

由于儒释道三教是从中国传播、影响至朝鲜半岛,这是中朝、中韩和处、和立的基础,三国之间长期“以邻为伴,以邻为善”“讲信修睦”,友善友好、互济互帮,共同为和平、发展、合作、共赢而奋斗。

注释:

[1][2][4][5][6][15][韩]金忠烈:《高丽儒学思想史》,台北: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,1992年,第15、24、55、50、65、326-328页。

[3][12][13][14][韩]柳承国:《韩国儒学史》,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9年,第1、97-98、100、102页。卫满朝鲜(公元前190—108年)为古朝鲜时代最后的王朝,汉高祖统一天下,以庐馆为燕王,燕人卫满入朝鲜,后自称王,为卫满朝鲜。

[7]《高丽史·洪儒》卷五记载:“弓裔纵虐太甚,淫形以逞。杀妻、戮子,诛夷臣,僚民涂炭,疾之如仇,桀纣之恶,无以加也,废昏立明,天下之大义,靖公行殷周之事。”

[8]《太祖世家》,《高丽史》卷2。

[9]参见韩国哲学学会编:《高丽初期的风水图谶思想》,《韩国哲学史》(中),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1996年,第12-14页。

[10][11][16]参见李魁平、何成轩:《东亚与和合——儒释道的一种诠释》,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2005年,第277、280-281、284-286页。

[17][18]《修己》,《圣学辑要》,《栗谷先生全书》卷21,汉城:驷江出版社,1986年,第479、463页。

[19][20][21]《醇言》,《古潭丛书》(3),1993年,第5、12、12页。柳承国教授认为这是栗谷弟子们的著作,《总论》为栗谷所著。道士董思靖居清源天京观。

[22]《退溪先生言行通录·实纪》卷1,《增补退溪全书》(四),首尔:成均馆大学 校大东文化研究院,2010年,第16页。

[23]蔡茂松:《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》,台北: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,1995年,第580页。

[24]李敦化于1920年创办《开辟》杂志,将崔济愚思想分为精神开辟、民族和社会开辟加以理论体系化的发展。他在《新人哲学》是这样分的,他宣传崔济愚“辅国安民布德天下”时强调个人精神开辟,实乃开放思想。

[责任编辑:李本红]